

# 民事诉讼中事实认定权的配置研究

陈泓言

441322\*\*\*\*\*0217

**摘要：**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权配置是关乎诉讼模式与裁判公正的核心议题。本文系统研究了该权力的内涵、性质及其以当事人主义、职权探知主义与诉讼效益原则为代表的理论基础。通过剖析我国立法现状与司法实践，本文揭示出当前配置中存在权责边界模糊、法官心证制约不足、资源配置单一及陪审员作用虚化等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套综合性的优化路径：核心是确立当事人与法院协同发现事实的协同主义模式；关键是构建依据案件类型与审级功能而差异化的多层次配置体系；保障是健全以裁判文书说理为核心的权力制约机制；并需切实落实人民陪审员的实质性事实认定权，以期构建一个权责清晰、运行高效、裁决公正的现代化民事事实认定制度。

**关键词：**事实认定权；协同主义；多层次配置体系

**DOI：**10.64216/3080-1486.26.02.075

## 引言

民事诉讼中，事实认定是连接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核心环节，而事实认定权在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如何配置，更是直接决定着诉讼的构造、效率与公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着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查证职责边界模糊、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事实审级功能虚化等问题，亟待从理论与制度层面予以回应。鉴于此，本研究旨在系统剖析事实认定权配置的基本理论，深入审视我国立法现状与实践困境，进而提出以协同主义为导向、多层次体系为框架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 1 民事诉讼事实认定权配置的基本理论

### 1.1 事实认定权的内涵与性质

事实认定权，是指法院在民事诉讼中，通过法定的证据和程序，对当事人争议的、关乎案件裁判结果的案件事实之真伪与否进行判断和确认的权力。它是司法裁判权不可或缺的核心权能，与法律适用权共同构成审判行为的两个基本面向。就其性质而言，首先，它具有职权性（或称公权性），即该权力专属于国家审判机关，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是行使此项权力的唯一主体，当事人享有的是与之对应的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其次，它具有判断性（或称认识性），这意味着事实认定并非对案件客观真实的简单“复写”，而是在程序正义框架下，法官依据证据规则、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对证据材料进行审查、评价和推理，最终形成内心确信（心证）的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理性判断活动。这一性质决定了自由心证原则成为现代民事诉讼事实认定的基石。

### 1.2 事实认定权配置的法学理论基础

事实认定权的配置并非任意为之，而是深植于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之上。首先，程序主体性原则与辩论主义（当事人主义）要求尊重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主张“谁主张，谁举证”，将提出事实和证据的主要责任配置于当事人双方，法院则处于相对消极的中立听证地位。这种配置旨在通过当事人的对抗与竞争来发现事实，并保障了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与处分权。其次，与之相对的是司法能动性职权探知主义思想，该理论强调法院在发现真实、维护公共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尤其在涉及身份关系、公共利益等案件中，法院应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而不完全受当事人所提供证据材料的束缚。最后，诉讼效益原则则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要求事实认定权的配置必须考虑司法资源的有限性，通过举证时限、自认、推定等制度，在当事人与法院之间进行合理的责任分配，避免事实调查陷入无休止的纠缠，以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事实认定权在当事人与法院之间进行动态配置的多元价值根基。

### 1.3 事实认定权配置的基本模式

纵观各国诉讼制度，事实认定权的配置主要呈现出三种典型模式。其一为当事人主导型模式，以英美法系对抗制为典型。在此模式下，事实认定的责任几乎完全由当事人承担，双方律师负责证据的调查、筛选与庭上呈现；法官扮演消极仲裁者，确保程序规则被遵守；陪审团则作为事实的最终认定者。这种模式强调当事人之间的竞争是发现真实的最佳途径。其二为法院职权探知型模式，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多具此特征。虽然当事人仍



负主要举证责任,但法官被赋予广泛的诉讼指挥权和证据调查权(释明权),可主动询问当事人、证人,并可依职权调查对裁判重要的事实与证据,其角色更为积极,旨在弥补当事人诉讼能力的不足,协同发现客观真实。其三为协同主义模式,这是现代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它试图超越前述两种模式的二元对立,主张事实发现是当事人与法院共同的任务。当事人承担首要的举证责任,而法院则负有协助当事人明确主张、适时释明、并在必要时依申请调查证据的职责,二者在程序推进中相互协作,以期在尊重当事人主体性的同时,更高效、更准确地认定事实,实现实体公正。

## 2 我国民事诉讼事实认定权配置的现状与问题

### 2.1 立法层面的配置现状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事实认定权的配置,呈现出以当事人举证为主、法院职权调查为辅的混合式特征,并在不断演进中逐步明晰各方权责。《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确立了当事人负有提供证据的主体责任,构成了事实认定权配置的基石。与此同时,立法为法院设定了必要的职权空间:其一,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时,法院可依其申请进行调查取证;其二,在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身份关系等特定情形时,法院可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此外,《人民陪审员法》规定在七人合议庭中,陪审员与法官共同对事实认定问题行使职权,体现了司法民主对事实认定权的分享。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举证时限与后果,并规范了法官审查判断证据、形成心证的自由与边界。

### 2.2 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样态

在司法实践中,事实认定权的运行样态远比立法规定更为复杂,呈现出多种力量交织的博弈图景。在理想层面,立法期望的“当事人对抗、法官居中”的样态在部分案件中得以实现,当事人通过充分的举证、质证推动事实发现。然而,在现实层面,更普遍的现象是当事人因举证能力不足而面临“证据提出困境”,此时法官面临两难:若严格保持消极中立,可能导致事实真伪不明与裁判不公;若过度介入调查,又有损中立地位并滋生依赖。这导致实践中法官时常通过行使“释明权”等方式进行隐性干预,事实认定权的界限变得模糊。在审级关系上,二审法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虽原则上限于审查其“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但实践中基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理念,常常会对事实问题进行重新审查,导致“两审终审”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两审

都是事实审”,削弱了一审的中心地位。人民陪审员在多数案件中“陪而不审”,其事实认定权未能有效行使,也是不争的现实。

### 2.3 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于上述立法与实践的脱节,我国民事诉讼事实认定权的配置暴露出几个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首要问题是权责不清,即当事人举证责任与法院查证职责的边界模糊。这既可能导致法院职权“越位”,不当替代当事人收集证据,削弱举证责任制度的效力;也可能导致法院在必要时“缺位”,对当事人的举证困难袖手旁观,造成实质不公。其次是权力失衡与制约不足,法官在审查证据、形成心证方面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其心证过程的公开与说理要求仍显薄弱,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与程序性约束,易滋生态意。再次是配置单一与效率不彰,未能根据案件类型与审级功能的差异进行精细化的分层配置,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财产纠纷与家事纠纷在事实查明方式上区别不大,无法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利用。最后是陪审员作用虚化,人民陪审员的实质性参审权保障不足,其制度设计的民主价值与知识补充功能在事实认定环节未能充分实现。

## 3 优化我国民事诉讼事实认定权配置的路径构想

### 3.1 确立协同主义的事实认定模式

为克服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之流弊,我国应旗帜鲜明地确立协同主义作为事实认定权配置的基本理念。此模式的核心在于,将事实发现视为当事人与法院共同的任务,二者在程序推进中各司其职、相互协作。具体而言,首先必须强化当事人的举证主体责任。这是协同主义的起点,需通过完善举证指导、严厉制裁无正当理由的逾期举证、滥用举证权利等行为,促使当事人积极、及时地履行其主张与举证义务,形成有效的对抗基础。其次,需优化法院的职权辅助作用。法院不应是消极的旁观者,而应积极行使诉讼指挥权与释明权,通过适时地发问、提醒甚至晓谕,协助当事人明确争议焦点、补充不完整的陈述与声明,引导举证方向。同时,必须严格限定并明确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主要集中于涉及公益或程序性事项,防止其退回“超职权主义”的老路。对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的证据,则应畅通其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渠道并简化程序。最终,通过构建这种“当事人承担首要责任,法院提供程序保障与必要协助”的互动机制,在尊重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逼近客观真实,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



### 3.2 构建多层次的事实认定权配置体系

鉴于民事案件的多样性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一刀切的事实认定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构建一个精细化的、多层次的权利配置体系。这一体系应包含两个维度：其一是根据案件类型进行横向差异化配置。对于普通的财产纠纷，应严格贯彻辩论主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与举证选择，法院保持中立听证；对于简易程序与小额诉讼，则应赋予法官更强的程序管理权与依职权查证的灵活性，以效率为首要价值；而对于家事、人事、环境公益诉讼等特殊类型案件，则需强化法院的职权探知职责，主动调查对裁判有重要意义的事实，以维护社会公益与弱者权益。其二是根据审级功能进行纵向差异化配置。必须确立一审程序作为事实认定中心的地位，配置最全面、最充分的事实调查权，力求在此阶段固定证据、查清事实。二审程序则应从“全面复审”转向“事后审”为主，其事实认定权应侧重于审查一审认定事实的程序是否合法、心证形成是否有据，原则上不再接收新的证据材料，仅对少数符合法定条件的“新证据”予以考量。再审程序作为非常救济渠道，对事实认定权的启动应施加最为严苛的限制，仅针对足以动摇原判基础的根本性错误，以此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与司法权威。

### 3.3 健全对事实认定权的制约与保障机制

为确保事实认定权在法治轨道内公正、理性地运行，必须建立一套刚柔并济的制约与保障机制。制约机制的核心在于以公开促公正，以程序防专断。首要的是强化裁判文书对事实认定理由的公开与说理，要求法官必须详细阐述其采信或不采信某项证据的理由，展示其运用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从证据推导出案件事实的完整心证过程，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的检验。其次，应完善证据交换与质证程序，确保所有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都经过双方当事人的充分辩论和质询，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这一最基本的程序保障。在外部监督上，应合理发挥检察监督的作用，对于因虚假诉讼、程序严重违法等导致事实认定出现重大错误的生效裁判，检察机关可通过抗诉或检察建议方式进行监督。同时，保障机制亦不可或缺，它旨在为法官独立行使判断权提供支持。

### 3.4 落实与完善人民陪审员的事实认定权

要让人民陪审员制度从“形同虚设”走向“实质化参审”，关键在于真正落实其在七人合议庭中与法官共同行使事实认定权的法律定位，并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

首先，必须在诉讼程序中予以刚性保障。从庭前阅卷、法庭调查的发问到合议庭评议，都应确保陪审员能够全程、深入地参与事实发现的全过程。庭审中，法官应引导双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陈述和辩论，使陪审员能够充分理解案情。其次，必须完善法官对陪审员的指引与沟通规则。法官负有法律指引义务，应就案件涉及的法律构成要件、证据规则等向陪审员进行必要说明，但必须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暗示、诱导或施加不当影响，确保陪审员基于普通公民的常识、常情、常理进行独立判断。再次，要革新合议庭评议机制。评议应先由陪审员发表意见，法官最后陈述，防止因法官先入为主而压制陪审员观点。应创设良好的评议氛围，鼓励陪审员畅所欲言。最后，需健全履职保障与培训机制。加强对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能力基础培训，重点在于证据审查、逻辑推理等方面，而非精深的法律知识。同时，落实其职务保障和津贴，解除其后顾之忧。

## 4 结论

我国民事诉讼事实认定权的优化配置，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权责清晰、协同高效、制约有力的系统化方案。未来改革应坚定迈向协同主义模式，明确当事人举证主体责任与法院职权辅助的边界；并依据案件类型与审级功能，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配置体系，尤其要强化一审事实认定的中心地位。同时，必须通过强化裁判文书说理、完善质证程序来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通过落实人民陪审员的实质性参审权，注入常识与民意。唯有通过这种多管齐下的综合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权责不清、运行失范的困境，最终建立起一个兼具公正、效率与权威的现代化民事事实认定制度。

## 参考文献

- [1] 王雪羽. 民事诉讼中原告适格的审理程序重建[J]. 当代法学, 2025, 39(06): 128-141.
- [2] 冯淑英. 民事诉讼受理范围实务问题研究[J].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25, (05): 90-95.
- [3] 颜卉. 合议制下法官事实认定权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进路[J]. 现代营销(信息版), 2020, (05): 68-71.
- [4] 纪格非. 论刑事判决在民事诉讼中的预决力[J]. 当代法学, 2020, 29(04): 97-107.
- [5] 王琦. 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J]. 中国法学, 2021, (04): 250-266.